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

丛书主编：陶 坚

国家经济利益与 全球公共物品

张士铨◎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

丛书主编：陶 坚

国家经济利益与 全球公共物品

张士铨◎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公共物品 / 张士铨著.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6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 / 陶坚主编)

ISBN 978-7-5130-4127-0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全球化—经济利益—研究②经济全球化—公共物品—研究 IV. ①F014.1②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9427号

内容提要

以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方法,对国家面临的利益格局调整、国家利益的获得以及它们和全球利益的博弈关系,对国内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和面对的矛盾逐一展开分析。并提出了精辟观点:第一,国家利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取决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组合既超越了国界限制也打破了意识形态束缚;第二,增进一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说明并夯实各方的利益基础,否则国家利益就是空谈,无法实现;第三,国家利益有其内在结构,在一定外在环境下各种利益之间存在互补与替代关系,优先发展经济利益是取得国家利益的关键;第四,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利益格局和公共物品的供需关系,在国家实力提升、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硬公共物品”为先导,逐渐对“软公共物品”发力,促进我国利益与全球利益融合,提升我国的全球影响力。

策划编辑:蔡虹

责任编辑:杨晓红 李瑾

责任出版:刘译文

封面设计:邵建文

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公共物品

张士铨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14	责 编 邮 箱: 1152436274@qq.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7-5130-4127-0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以下呈现给读者的,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师生的最新作品。它们是国际经济系课题组承担的“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取名为“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共5种。

全球治理与中国,是贯穿这项课题研究的一条主线,一个既宏大、长远,又具体、直接关系到世界进步、国家繁荣和企业发展的问題。

陶坚教授主编、十多位老师和同学协力完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一书,以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时代为背景,展开分析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涉及的多领域、多层面议题。上篇,着眼于找规律,启发思考。作者对全球治理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关系,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了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接着,以二十国集团、欧盟、东亚地区、美国为例,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了各自的政策和实践、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下篇,立足于谋对策,紧扣中国。作者围绕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角色、现状和能力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经贸不平衡关系的治理,对美欧贸易协作的应对,以及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出了全面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系统、有见地、可行的政策建议。

张士铨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在全球化和转型两个大背景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面对着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处理增进国家经济利益和现有全球公共物品的相互关系。虽然它们都是现实存在并有多样化的表现方式,也是当今我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获取国家利益,在此

基础上谋求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着力点所在，但为什么这样做，很多人尤其是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不甚了解。所以，他在专著《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公共物品》中，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方法，依次对国家面对的利益格局调整、国家利益的获得以及它们和全球利益的博弈关系，对国内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和面对的矛盾逐一展开分析，并提出了精辟观点：第一，国家利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取决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组合既超越了国界限制也打破了意识形态束缚；第二，增进一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说明并夯实各方的利益基础，否则国家利益就是空谈，无法实现；第三，国家利益有其内在结构，在一定外在环境下各种利益之间存在互补与替代关系，优先发展经济利益是取得国家利益的关键；第四，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利益格局和公共物品的供需关系。在国家实力提升、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硬公共物品”为先导，逐渐对“软公共物品”发力，促进我国利益与全球利益融合，提升我国的全球影响力。

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领域。史亚东博士在《全球环境治理与我国的资源环境安全研究》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主体、原则和政策工具，结合我国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现状，对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对于我国资源环境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她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探讨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改进方向，以及对我国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还具体分析了节能减排约束下我国能源价格风险和能源效率问题。

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不断加快，推动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全球各地区的迅速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刘中伟博士的专著《东亚区域服务贸易

自由化合作发展机制研究》，在总结借鉴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东亚区域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东亚区域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发展机制和区域经济治理问题，并就中国参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进程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一是通过回顾全球和东亚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对东亚地区服务贸易总体状况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点与趋势进行了阐述。二是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理论分析的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在提高经济效率、形成贸易效应方面的作用在服务贸易领域同样适用，并对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积极作用明显。三是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发展，一方面在于各经济体自身的服务业发展，服务生产要素资源在产业内的整合、互补和投入程度，具备开展服务贸易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东亚各经济体要具有开展合作的意愿，并通过寻求签订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四是在全球价值链整合和服务业跨境转移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对东亚区域服务贸易体系和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构建有利于东亚地区长远发展的稳定、平衡的合作与治理机制，将最终成为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的制度保障。五是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可以立足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深化，改善自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大力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加快促进服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把握东亚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进程重点，注重合作与治理机制整合发展；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政策体系，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据此，作者指出，当前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主要通过其共享机制、开放机制、竞合机制和经济增长机制四种机制，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体深入开展服务贸易合作，完善区域开放性经济一体化和治理机制建设，促进东亚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刘斌博士的《21世纪跨国公司新论：行为、路径与影响力》，重点围

绕跨国公司的经济属性、管理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三维属性”，从一个整合的层面，结合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对其中的七大核心问题进行分析 and 阐述。全书通过对跨国公司的产业行为、经营行为、战略行为、组织行为、创新行为、垄断行为、主权行为进行纵向历史性总结分析，阐述了在相关领域内跨国公司行为的特点、模式、路径，以及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间跨国公司在相关领域行为的新动向。本书将中国跨国公司的行为特点和发展现状视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分别在相关的章节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希望由此描绘一个对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分析的完整视图。

相信上述5部著作能够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靠什么来维护国家利益，又如何扩大全球影响力。

作者们将收获的，是学术发表的喜悦和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的荣耀。

是为序。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校长）

2015年7月16日于坡上村

引 言	1
第一章 全球化和转型背景下的新问题	18
第一节 全球化、转型与利益关系	20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39
第二章 利益与国家利益	44
第一节 利益的辨析	44
第二节 从个人、微观利益到国家利益	66
第三节 国家利益内涵的再思考	87
第三章 国家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体系中的地位	94
第一节 国家经济利益存在的条件	94
第二节 国家经济利益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100
第四章 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公共物品	103
第一节 公共物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103
第二节 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	113
第五章 公共物品实践和理论演变——转型角度	119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物品	119
第二节 转型进程中公共物品的变化轨迹	128

第六章 公共物品实践与理论演变——经济全球化角度	141
第一节 由国内公共物品到全球公共物品	141
第二节 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质及特征	153
第七章 全球治理进程与全球公共物品	162
第一节 发展和变革潮流提出的新课题	163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169
第三节 全球经济治理趋势与全球公共物品的关系	176
第八章 案例和新问题分析	181
第一节 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181
第二节 全球环境与生态合作	187
第三节 贸易摩擦中体现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公共物品之间的 关系	194
结束语	200
后 记	202

引言

本研究课题“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公共物品研究”，系我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承担的“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一个子课题，也是该总课题涵盖的两个系列（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第二个系列中的一本专著。鉴于我系致力于打造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和科研两个层面的专业特色——全球经济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以配合国家崛起和突出我校的学科建设方向（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大小两个目标，研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基石在于国家利益的得失，而国家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国家经济利益）和全球治理（经济治理既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又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手段便是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和运用）及其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本书的主旨。值得说明的是，本课题的两个关键词（国家经济利益和全球公共物品）是在国家利益和公共物品顶级词汇下的“二级”词汇，但它们又同属于当今我国参与国际生活、发挥能动作用主要和率先追求的目标，因此说明它们之间关系非常必要。为符合逻辑叙述要求，应该先给它们盖上“帽子”，即从它们的上一层——国家利益和公共物品开始，循序渐进地展开分析。

利益是我们耳熟能详和经常用到的词汇，尽管人们对利益内涵和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即利益结构可能有不同的解读，然而却普遍承认，利益是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国际组织决策和行为的出发点和动机。可以将他们称之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争端冲突，同一利益主体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利益差异，必然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展现。据此，可以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等，列为涉及利益格局的一些基本关系。当今人们为什么会对利益格局予以强烈关注？首先来源于自身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得到增进还是受到损害——研究利益时应该坚持“问题导向”。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当氧气



充足的时候，人不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是氧气不足的时候，便无法生活，因为他已经脱离常态。他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采取措施适应“新常态”下利益格局的变化，或者逃离现实。显然，后面这一条不足取，也不是大多数人行为的真实写照。另外，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利益主体而言，也要摸清与自己相关的其他利益主体的打算，只有在共赢基础上，自身利益的实现才是踏实有效的。建立在非排他性和协调共赢基础上的利益关系，以增进共同利益关系为主旨，这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制度、机制和基础设施，便是我们所论及的公共物品。

凡平常对社会生活有观察有思虑的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些利益关系中既有一致又有争端的方面：比如个人恪尽职守对集体利益的增进，或者争权擅行对集体利益造成的损害；考虑到行业和本部门的利益，却没有从公共和国家角度着眼——只强调本部门的出口利益却未注意到国际收支的平衡；就一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关系而言，更是如此。谁都知道，自由贸易有助于全球利益的增进，有助于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配置资源。然而当下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普遍奉行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贸易保护政策却大行其道；经济利益本来是政治纷争的缓冲器，但某些国家中的政治领导人为了迎合选民需要，增加自己的票仓，断然割断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渠道而为自己的进身之阶，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利益关系不但变动不居，因时因地不同，而且也难于用统一的标准要求人们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集体、公共、国家甚至全球的总体利益。不同的利益层次之间，即便在每一利益层次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协调矛盾，化解冲突，都是不容易甚至长期无解的事。为什么如此？看起来很难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驱动着人、组织和国家关系的分分合合；利益关系相互交织，任何一种关系环境变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关系，改变利益格局的面貌。然而，利益的变动似乎有规律可循，因为它毕竟是下至个人，上至国家和国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体行为的驱动器，人们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制定政策，背后头等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利益关系。按照汪丁丁的说法，只要试图把经济学“实践起来”，别总是纸上谈兵，而是用其阐述的道理，试图改善现实世界里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会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是永远

置身于利益冲突当中的。这一基本的问题意识,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它渗透到一切政治经济问题当中,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工资、赋税、劳动、资本、土地、财政、金融,一切公共物品都不能逃于其外,都少不了利益关系的支配。置身不同人群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之间,寻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①。当然,我们要强调的是,利益必须是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封闭条件下缺少利益的实现条件,此方利益得失必然和彼方利益得失密切相连;利益和争取利益的行为是可变的,获取了近期利益的主体必然提出对远期利益的要求,就像谚语所说,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利益冲突是绝对的,利益协调和共赢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存在,问题是怎样让这种局面维持得更长久一些。

正因如此,研究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就应该从利益主体的想法和做法开始。

第一,利益的考量和利益的计算——理性人的计算。理论上,理性人时时刻刻都在进行成本和收益计算,否则不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这必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市场机制指挥人们行为的信号是实实在在的,价格、利润和市场份额等都跟人的利益直接相关;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即便对自身利益有所算计,也不存在实现的条件。因为价格等信号,都不是市场供求变动的反映,也不能为人们自主配置资源提供依据,当然更不能调节人的行为。当然,不管计划还是市场体制,人的行为不可能只以利益为导向,还有其他动机,如社会地位、荣誉、被人接受等,然而用这些与物质利益动机相比,后者始终居首——只有基本物质利益得到满足,其他才能提上层面^②。即便是个人利益(更不用说集体和国家利益)也有层次区别,随着低层次利益的实现,必然过渡到对高层次利益的追求,如果一味投入满足低层次的利益,其效果必呈递减趋势。除了上述这些之外,还因为利益是在社会生活与他人交往中实现的,所以个体在对自身的利益进行考量和计算的时候,还必须将和自己有关的利益主体

①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年版。

②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解释,基本需求首先指生存一类的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必须用收入来满足。



的利益边界以及自己和别人的利益交叉部分一并考虑在内。不同主体的利益边界指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外围，这是自身利益之底线，不容被别的主体的不付代价或低价换走。而与别人交叉部分指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重合区域。如果某人做事，既利己又利他，那么交叉部分的面积显然较大，换句话说，其自身利益的“正外部性”就越容易得到社会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利益的实质在于其主体的考量和计算，是内生而不是“被表现”的，是在竞争中外化的，而不是被“代表”出来的。即便真是代表，也必须看利益主体对代表者的“授权”。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授权制度，谁能保证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就是从事符合公共利益的工作？“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此就持怀疑态度。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理性行为人做事之前，先要研究利益获得和投入成本之间的关系，搜集足够的信息，也要对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及获得方式做个比较，盲目采取行动被认为是“缺心眼”。

第二，增进利益的政策和行动。面对眼前可能的利益得失，利益主体要有明确措施应对，就必须参考行动过程中外界的变量，否则就不可能获取利益——主动出击和被动的应对缺一不可。等着利益上门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并非当今社会利益主体的行为特点。当然“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可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斯密所论“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这种理想境界的条件在于，利益主体能否得到足够的、促使其科学决策的信息，政府能否为真实信息资源的流动，构建一种制度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怎样让政府信息更加真实透明，使人们相信，并在决策时有所依赖。

第三，必须迎合历史潮流，否则难以从中获益。很难想象，利益是在真空中实现的。这里的意思是，利益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事物上面，空谈利益不仅极其有害，问题是没有人相信^①。如果一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调节利益关系，谁还会回应这些政策？人对利益的追求，随时代变迁也会

^① 就像中国的“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说法，比较抽象，很有具体化的必要，才能让世人接受。张锋：《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共识网21ccom.net，2015-5-21。

提升追求利益的层次。所以要将利益分成若干部分,每个部分可能对应于不同的阶段。就国家利益的实现而言,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先解放的是捆绑在个人利益上的枷锁,没有个人利益的解放,个人乃至集体、社会和国家都不可能获得发展机会,国家利益也没有根基。此时没有人过多考虑全球利益,毫无疑问在当时条件下,相比国家利益,它处在次要地位;但在当今,以增大的国家实力和形象撬动国际关系争取对我国发展的有利格局时,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便成为我们追求的主要对象,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不要忘记必须使其和微观利益对接起来,否则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利益并非决定人的行为的唯一因素。大卫·休谟早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和人类的所有事务却是由观念支配的。观念的变革——价值观的变化导致利益观发生变化是不言而喻的^①。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有人不按个人或集团利益出牌的行为,也很难说明,有人不被短期利益诱惑而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

第五,考虑并尊重他方利益是获得自身利益的前提。因为利益不能离开社会存在,国家利益也不能离开别国利益和全球利益而存在,以邻为壑和对他人利益的冷漠态度都不利于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立足,更遑论发挥建设性作用。相反,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共识并以共同利益为根基的制度形式,才可能具有生机与活力。按照伯格斯特——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计算和分析,中国希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框架下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虽然这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合作协定TPP存在一定矛盾,不参与TPP每年要增加交易成本1 000亿美元。但他认为,这两个事情都是真实存在并会取得发展,谁都不能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当然FTAAP不如TPP成熟,主导国不明显,路线图不清晰。但是它具有的包容性却是TPP无从比拟的,显然不管发展层次高低,都能被纳入,相比之下美国主导的TPP倒有些曲高和寡,进入的条件比较严格。然而,若从发展前景上看,TPP却代表未来方向和谈判中的高级议题。所以中国要拿这个同美国主导下的TPP对抗,还有很大差距。而中国希望以自己的

^①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对这样的问题,有较好的论述。



方式加入TPP,美国亦不反对,参加TPP的国家对FTAAP也有热情。所以问题并非有人想象的那样,中美是竞争不合作,互相以竖旗笼络喽啰的方式反对对方。可以说两国之间利益既交叉存在又充满纷争,这是双方都承认的。不能以一时得失论短长。^①

从国家主体角度来看利益关系在世界中的变化,就可知道我国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离开全球潮流而存在。中国依仗全球化和转型——依据国际生产要素流动补充稀缺资源、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和国际金融体系融通资金,还有市场及规则等而崛起。倘若没有西方国家从前所做的铺垫——可称之为发展的参照,比如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成功经验和教训,很难激发我们自己的改革意愿,只靠蛮干“杀出血路”,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可以用历史说明这个道理:邓小平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开放开始时,首先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瞄准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这是因为舍他们无其他国家可以提供给我们稀少又急需的要素。就发达国家而言,帮助我国也是一个双赢结果,因为他们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最少也获得“分红”。反过来说,某个发达国家如果搭不上中国经济发展这班车就是损失,相对于其他得利者的差距就被拉大。所以说,中国发展离不开自身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但在今天中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已经得到充分提高的状态下(不但产品结构有了根本改善,而且生产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挟世界经济中第二大经济体量和第一的增长速度,我们对于世界的需求也跟以往有了很大差别:的确需要更多的生产要素(只不过所需生产要素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对资金需求已不像过去迫切,而以原材料、能源以及技术需求为主)和更为广阔的产品市场(制造业和服务类产品成为主流,而不是过去意义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这一情况说明,中国已经全方位地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需求和愿望已被世人熟知。如果再一味地“韬光养晦”“闭口深藏舌,安得处处牢”,不宣示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诉求和责任,不但不合时宜还会被人认为虚伪和不负责任。我们知道,在国际政治的话语里,所

① C.Fred Bergsten: “Bridging the Pacific: 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谓崛起,就是一个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管用什么方式取得)的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国际地位急速提高,影响力迅速加大,从而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分步体现出来的。就中国而言,经济为先取代了过去的凭借武力崛起(相比于其他大国的历史崛起,中国经济增长不存在海外扩张的诉求)的确不容置疑:贸易金融投资的数量变化、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指标(在IMF中的份额的扩大,在世界银行中的贡献加大,这些都是衡量一国参与全球化的尺度——外在的一般性指标,也可以看成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世界经济蛋糕做大)。当然,增长的快速也会引起别人的不适应,比如说对原料市场争夺和加剧对产品市场占领。所以,我们也要让世人知道,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是按照国际经济的规则,以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展开竞争的。

大国崛起是撬动国际利益关系变动的杠杆,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是我国的鲜明特点。我们理解的崛起是可持续的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有今天没明天的,是前后相连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崛起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其中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但诸种发展要素的变化却是最根本的,比如资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到后来出现剩余的变化,导致从吸收外资这种稀缺资源到对外直接与间接投资,反映了当初的紧俏资源随着发展已经在国内过剩,必须寻求更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从对外经济关系角度看(比如一路一带,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全球公共产品”,作为主办方的我国肯定要投入更多并允许别国搭便车),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参与和支持,我国在自身利益扩展过程中,也需要符合他国利益,若是没有一个实现共赢的机制,中国的崛起必然受到他国的抵制;经济崛起,从本质上看,更需要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供给,相比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而言,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像资本那样的从短缺到剩余的变化,因此,还需要继续引进,而不是输出,这不但说明我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与美国无法比肩,也说明总体经济素质与我之大国地位尚有一定差距。

第一,“崛起的争议”。主要涉及按照什么标准衡量崛起,以及世人质疑中国崛起存在的问题。如果从GDP存量和增量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存



量居于世界第二，增量在30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可以说这是基于比较有利的国际条件和较低的基数）。种种情况表明，按照PP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可以称之为激进办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解释，中国的GDP已经于2014年超过美国，继2001年超过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这种算法多有质疑。主要是说购买力平价虽然能够消除人为操纵汇率的弊端，但不能解决由于国民收入、资本流动、贸易条件乃至政治因素变动对汇率的影响，也无从解决计算汇率的“一篮子物品”的组成问题，因此，人们对此结果都是一笑而过^①，并不将此视为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的“依据”。但是，如果按照实际宏观经济指标看，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第一的制造业大国等，则说明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些数据是搭载到高速增长的快车上。考虑到金融危机后经济回归“常态”，中国的增长速度依然在全球力拔头筹，又足以说明，“崛起”这件事本身没有水分。

然而伴随激进崛起的许多事情令世人担忧，比如资源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人口红利消失和严重的腐败等不一而足。“有问题”的崛起包含两层涵义：经济总量和在世界中的地位加强，“崛起模式”受到的挑战也越发尖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高速增长靠投资、人口红利、房地产泡沫和粗放发展，但现在这些都减少了存在的基础，因此，增长不得不回归常态——往日崛起的速度成为明日黄花。反过来说，这也是崛起引发的问题，逼迫我们不得不改弦更张。

第二，实力增长和责任担当。实力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大和责任担当不仅相辅相成，也是国际社会的要求。从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与全球经济的互动角度看，一方面它们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贸易活动的基础在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而我国在制造业领域中的生产和贸易规模总体上已经超过美国，尽管在结构上有些问题——高等级的制造业少，污染环境的产品多，但这些并不能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从过去注重吸引外资到向外直接投资并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侧重对要素市场的投资，为我国本土产品生产准备原料、燃料，而现在投资的重点

① 《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存在局限》，2014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报。